

参赛选手摩拳擦掌地等待入场,航拍直升机在体育馆上空盘旋,舞蹈演员身着五彩服装卖力表演,受邀明星的歌声则被淹没在观众欢呼声中……这种气氛热烈的典型奥运会开幕式场景通常来说预示着赛事主办方的多年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现在只需要待在后台祈祷一切顺利即可。

对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来说,情况却有些不同——7月17日当天,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时任加拿大首相皮埃尔·特鲁多以及73000名现场观众的注视之下,传统上首先出场的希腊代表团发现,他们通往体育场的通道几乎被正在施工的建筑工人给全部堵塞了。

彼时,体育馆中央一片欢腾,但在体育馆后台、摄像机镜头捕捉不到的地方,工作人员正在疯狂地挥动铁铲和扫帚清除来不及运走的建筑残渣。赛会开幕前几个月,3000多名劳工曾以24小时不间断施工的方式想要确保奥运会能有条不紊地展开。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成功。

事实上,被誉为“史上最漂亮的体育场”的蒙特利尔奥体中心最终直到1987年才宣告完全竣工——比赛结束11年后修好主体育场,这在奥运会历史上绝无仅有。

不光如此,当为期两周的奥运会最终结束时,蒙特利尔人发现他们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后遗症之中。据说这届奥运会欠下的巨债一直到2007年才完全还清,蒙特利尔的纳税人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所谓“蒙特利尔陷阱”的受害人。

据统计,1976年奥运会的最终花销超过预期的13倍。为了还清将近10亿加元的债务,蒙特利尔所在的魁北克省采取发行全民彩票,征收烟草税等手段进行筹资,引发不小的社会反抗。在短暂的全球关注度消散之后,蒙特利尔人发现摆在

里约奥运会场馆建设滞后和财政危机爆发等负面消息让许多人为之担心。事实上,早在40年之前奥运会就曾遭遇过相似的危机……

他们面前的是一连串政府贪污或渎职丑闻、一堆大而无当的体育馆以及持续多年的经济衰退。

纵情享乐的蒙特利尔

平心而论,2004年的雅典以及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也都先后遭遇到了奥运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但与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希腊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巴西不同的是,加拿大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列强,经济发达的蒙特利尔也似乎完全有操办一届无暇疵奥运会的实力。

“蒙特利尔人有纵情享乐的资本”——这是上世纪70年代加拿大人的共识。这座英法混血城市和它的兄弟城市多伦多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温文尔雅、成熟有教养并永远走在潮流前线。当多伦多的商业白领埋头苦干到深夜11点时,蒙特利尔人正在街头狂欢。

在那个年代,蒙特利尔是加拿大毫无争议的金融中心。这座城市融合了北美和欧洲的精华,包豪斯风格的摩天大楼和中世纪装饰的红



■ 蒙特利尔奥体中心

石教堂交相辉映,全世界的财富则滚滚而来。

正因为如此,当1970年蒙特利尔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上夺得第21届夏奥会的举办权时,时任市长让·德拉皮奥对其市民宣布说:“这就像家里多添了个孩子一样。”意即富庶的蒙特利尔无论如何都负担得起——毕竟,4年前在这座城市举办的世博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整座城市都弥漫着乐观的情绪。

德拉皮奥领衔的奥组委当时估计,整个奥运需要花费1.2亿加拿大元,主体育场奥体中心的预算为7100万加元。被称为“空想家”和“偏执狂”的德拉皮奥是个十足的宏伟建筑爱好者。在他的主导下,奥体中心选了最奢华、最狂放的一款设计:整个体育场被打造成一艘扬帆出海的巨轮,而高达175米的斜塔则构成了巨轮的“桅杆”——这座斜塔后来成为世界最高的倾斜式人工建筑,比美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还要高。

不曾料想到的是,进入70年代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经济

危机,物价暴涨导致场馆建设成本不断攀升。以钢铁价格为例,短短几年就翻了三倍。在这种情况下,德拉皮奥仍然坚持要按照原方案进行施工,不做任何妥协。此外,修建过程中劳资纠纷不断,1974年12月到1976年4月,工人罢工了155天,这使得施工进度严重滞后。

到1975年,蒙特利尔的上级、魁北克省政府再也看不下去了,整个奥组委和施工团队被迫接受调查。一位调查人员表示:“奥运会的筹办工作显示出系统性的腐败……其中一些涉案人员几乎是直接搬走钱箱……”

德拉皮奥虽然因为某些原因被免于起诉,但他的个人政治生涯也算到了头。那句“就像添了个孩子一样”的大话也一直成为媒体嘲笑他的把柄。

40年的蜕变史

虽然赛前历经波折,但1976年奥运会的比赛本身还算一帆风顺。唯一遗憾的是,作为主办国的加拿大成为首个没有夺得金牌的奥运会东道主,场面略微尴尬。

8月1日,第21届奥运会终于闭幕。奥组委统计最终花销为16亿加元,超过原本预算的13倍。而作为主要工程的奥体中心则花费了11亿加元,更是暴涨超过15倍。

与此同时,另一件大事件也在悄然发生:当年11月,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党获得了省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变成了魁北克省的执政党。这个政党一上台就宣布要举行一场独立公投,引发市场恐慌。消息

一出,加拿大保险业巨头“阳光生活”就把自己的总部从蒙特利尔搬迁到了多伦多,开启了蒙特利尔金融中心的衰落进程。

1980年的公投中,独立派虽然被否决,但金融业对蒙特利尔的信心已经遭受重创。再加上奥运会债务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蒙特利尔将加拿大第一金融中心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多伦多。

更让蒙特利尔人心塞的是,花了大价钱修出来的“昂贵玩具”最后还不怎么好用。

赛后,奥体中心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危险事故,原因都是当初设计施工不善。1991年,一块重达55000公斤的混凝土板从房顶滑落,所幸没有发生伤亡,政府只好用固定的房顶代替了之前可移动的屋顶;1999年,馆顶的一部分崩塌,冰雪顿时砸向了场馆里的工作人员。虽然工作人员随后安装了新的屋顶,但并不牢靠,仍然需要定期修补。

经济萧条、人口流失之后的蒙特利尔也无法吸引到更多的文体活动,因此奥体中心长期处于空置状态。2004年蒙特利尔展览队将主场迁离后,奥体中心的人气更是一落千丈。现今,奥体中心主要靠收取斜塔观光门票来维持运营。游客在登上斜塔后,蒙特利尔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但有报告指出,这项收入在巨额维护成本下仍然入不敷出。

40年之后终于逃出了债务陷阱的蒙特利尔也丢掉了“加拿大第一城”的头衔。它正在努力使得自己变得更加宜居、更加有内涵。如果说多伦多将长期占有经济和金融中心的位置的话,蒙特利尔则将捍卫自己的文化中心地位。这座城市现如今被誉为全球设计之都,街头艺术和世界一流的爵士乐让它重新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的大都会。

摘自《看世界》2016年8月上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15.“倒孙”风潮

孙眉在九龙“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生活十分拮据,但他对革命毫不气馁,仍一心支持孙中山革命。

孙中山献身革命,生活俭朴,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对之非常了解,曾撰文说:“若为了帮助穷苦的朋友们,或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孙先生是相当敢用钱的,但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单而朴素,既不喝酒,不玩女人,更不花不必要的钱。有电车的地方,他一定坐电车;而就是要坐小包车,也是算得很精,从不随便乱花。而且,不管天气怎样,他经常带着大衣和洋伞走路。这样,万一下雨,他还是一样可以去任何地方。”

然而,同盟会中以章太炎、陶成章等为首的一批骨干,先后两次以所谓孙中山的经济问题掀起来势汹汹的“倒孙”风潮。其中第二次“倒孙”风潮牵涉到孙眉与孙中山的家属。

1909年9月,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南洋革命党人,诬称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据为己有,“借革命以骗财”,家中发了大财。他们并以川、粤、湘、鄂、苏、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颠倒黑白、充满污蔑之言的《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又称《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存有巨款,孙眉在九龙建造的房屋全是用孙中山的汇款;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章太炎对于孙中山暗派汪精卫从南洋到东京,完全撇开他这个主编而秘密筹备《民报》的复刊而怒不可遏,愤然撰写了《伪〈民报〉检举状》,不仅怒骂孙中山、汪精卫,还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保皇党借机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大肆进行辱骂和攻击。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中山的诽谤,蛊惑人心,欺骗革命同志,并在华侨中产生恶劣影响。孙中山对此十分气愤,同年10月下旬,他在巴黎吴稚晖办的《新世纪》撰文揭露陶成章之流的诬蔑。他写道: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凡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入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耳,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使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仰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当时,受到章太炎、陶成章“倒孙”风潮的影响,不明真相的华侨和南洋革命党人曾派人到香港调查,但调查人看到的则是孙中山九龙的家里,只有几间旧房子,此外一无所有;至于孙眉的家,是自己修的草房,并靠耕种度日。此时,调查人不禁惊问:“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蹉跎呢?”至此,事实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了。

两次“倒孙”风潮最终导致了同盟会的分裂,对反清革命的进程无疑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当时处在生活困境中的孙眉仍关心和支持孙中山革命,而且自己也不顾一切加入反清革命的行列之中,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多次重大活动。

17.婚礼

黄莺在伟庆食品商店待了有些年头了,对这份营业员工作早已麻木。她几乎没有机会见到嘉毅,虽说她内心不愿意和嘉毅断了,但自己把话已说出口,也举行了所谓的了断吻别的仪式。可尽管如此,仍挡不住对他的思念,猜测他是否和葛英姿联系上,他们是否恢复了恋爱,如果没有,是否在女生众多的大学里找到了心爱的女朋友。不论怎么样,他应该来看看自己才是呀,即使一般朋友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来看看。每每想到这里,心里不免泛起一丝对嘉毅的怨恨,恨他不通情理,恨他冷漠。

也许是单相思给她带来了无限惆怅,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终于挡不住周围阿姨大妈们的轮番劝说,和一位经常来店里批发烟酒的小饭店个体户侯斌谈起了恋爱。

侯斌,因为他两年从前近郊农场病退,回到上海没有工作,申请了一个餐饮的个体户执照,父母就腾出了在浙江路上的街面房子,开了一家餐馆。虽然饭店面积不大,只雇了两个厨师和两个跑堂的外地小姑娘,可在父母的帮助下生意做得不错,收入比起在国有企业的员工要多出了许多,领先一步进入了上海滩第一批万元户的行列。

快要结婚了,一般是女孩子最快乐的时候,憧憬着新婚的住房布置、婚宴安排等。可是这一切都提不起黄莺兴趣,让她想的最多的最纠结的是,如何将自己要嫁人的消息告诉嘉毅等好朋友,他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婚事,会如何看待自己嫁给个体户,其中最关心的就是嘉毅的态度和想法。她太在乎嘉毅了,似乎这些事情比结婚还重要。

黄莺抽出时间,挑选了一个傍晚时分去卢蓉的学校。卢蓉问:“怎么,想我了?”黄莺挺了挺身子宣布:“我要结婚了。”卢蓉马上问:“新郎官是谁?”黄莺躲躲闪闪地将自己和阿斌恋爱的故事说了一遍。卢蓉问道:“沈嘉毅知道你要结婚的事吗?”黄莺说:“我就是找你帮忙,想让你替我通知一下他,还有郝予兴,我希望你们能来喝喜酒。”卢蓉顿了顿说:“这是好事,他俩我来通知。”

嘉毅怀着复杂的感情接受了邀请,参加

了黄莺的婚礼。婚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饭店,总共五桌客人,客人中一大半是新娘单位的同事。

今天他们三人正襟危坐在一大群大嗓门的阿姨大妈们当中,显得有些另类,有些拘谨。当同桌的大妈说新郎新娘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时,卢蓉朝予兴和嘉毅做了个鬼脸,凑在予兴的耳边小声道:“这种话只有他们这种人说

得出,黄莺怎么会看上开饭店的,一点都不浪漫。”予兴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议论黄莺,心想自己是打桩的,可能更不在你卢蓉的眼里了。

这时新郎新娘端着酒杯过来敬酒敬烟,大家纷纷站起来。当轮到新郎新娘向嘉毅他们三人敬酒时,黄莺笑盈盈地朝他们看了一遍,没有把目光停留在任何人身上,喜滋滋地向新郎介绍道:“他们是我中学的同学,就像亲兄妹一样,现在在读大学。”

先是嘉毅略带微笑举杯,和新郎新娘碰杯祝贺:“恭喜你们,百年好合。”当他低头抿酒时那一刻,瞟了一眼黄莺,而她也正用眼睛的余光偷看着他,他们目光对视的时间太短太急,一瞬间双方都无法读懂其中的内涵。

予兴和卢蓉彬彬有礼地喝完酒后,新郎新娘遭遇到强劲的对手,同桌的那几个阿姨大妈不依不饶地要求新郎新娘在敬酒前必须表演一个亲热的节目,还拿出了一颗奶糖要他们当众分享。他们拗不过这帮阿姨大妈,新娘紧闭双眼用牙齿咬住半颗糖,妩媚的脸颊变得扭曲难看;新郎想潇洒地尽情表演,伸手挽住新娘的脖子,凑上去咬下另半颗奶糖,只因动作幅度过大和新娘没配合好,显得笨拙别扭,变成了和新娘拧在一起了,让人感到好笑,一点不像是一对亲热有加的新婚燕尔。

嘉毅看完他们的表演,眼神中夹杂了一丝不为人们注意的不屑,拿起酒杯和予兴碰了碰杯问:“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予兴答道:“至少要等她毕业吧。”扭头又向卢蓉确认似的,“现在还定不了。”而卢蓉把头扭向一边,似乎忙着看新郎新娘,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

嘉毅有点后悔当着卢蓉的面问这样的问题,又想起他们在黄莺小阁楼吃饭时的恩爱爱,不免有些替他心痛。

七九届高中生

宋贤雷

